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图文互证视野里的泰东图书局 门市店梳考

成立强

摘要：泰东图书局于 1914 年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了门市店,最初租的是娼妓聚集的青莲阁楼下的一间门面,门牌号是 119 号;1919 年搬迁至 124—125 号,拥有了两间门面。这次搬迁既是书局营业扩大的体现,也是新书业意欲远离妓业的象征。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上海废娼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申报》广告等图文史料可以确证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搬迁时间大概是在 1919 年 6 月至 8 月之间。其搬迁后曾以英国伦敦现代的书店样式装修过。1919 年 9 月,赵南公正式启动了重建理想的新泰东的计划。

关键词：图文互证;泰东图书局;广告;出版

泰东图书局(以下亦简称泰东)于 1914 年由欧阳振声、谷钟秀等创办于上海,1916 年起由赵南公负责经营管理。1938 年赵南公病逝,泰东图书局亦不复存在。泰东图书局前后存在了约 25 年,近四分之一世纪,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泰东图书局孕育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上海新潮社”,扶持了最著名的现代文学社团“创造社”,支持了“孤军社”“白露社”“太阳社”“狂飙社”等文学社团。此外,泰东图书局还是众多新书业出版机构的孵化基地,离开泰东的郭沫若、张静庐、张一渠等都创办了新的出版发行机构,且都在现代出版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泰东图书局规模虽

小,却勇于创新,敢于求变,就扶持文坛新人(更准确地说是文坛偶像破坏者)及孵化新的出版机构两个方面而言,泰东图书局取得的成就是首屈一指。

已有论著叙及泰东图书局时指的都是福州路上的泰东。所谓福州路上的泰东,其实指的就是泰东图书局在福州路上开设的门市店,或称之为“发行所”。早期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书刊,发行一栏的落款一般都是“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发行”“上海英租界福州路”“发行所:泰东图书局”等。那么这家门市店究竟是什么模样,研究者偶有提及,也只是点到为止,很难让人生成清晰的认知。较为严谨的论著会在地图上指出泰东图书局的具体位置,但标注出来的

位置往往只有一处,这家门市店的搬迁及门牌号的变化等皆不被提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落下的烟尘终将掩盖各种遗骸,像泰东这样的书局,注定是较早被埋没的一批。

我在《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一书中写道:“所谓泰东图书局的旧址,也就是泰东图书局开设在福州路上的门市店曾经所在的位置。随着赵南公的逝世,泰东图书局正式成为了历史名词,泰东图书局旧址早已面目全非。后人虽然能够按图索骥,却不能凭空想象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真实模样。在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物中,有一幅没有署名的插图,所画即泰东图书局。这张素描式插图的存在,多少为后人想象当年泰东图书局的模样提供了一个参照。”^①书中所用的插图是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本书里看到的,当时只是觉得有意思,还没有见到过类似的标注了“泰东图书局”字样的图像,于是随手用手机拍了下来,就是下面这张照片:



泰东图书局图像

在《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中,我没有注明这幅图的出处。在校对清样的时候,编辑让我提供这幅图的出处,我在手机上翻出了照片,查看照片的拍摄日期,然后拼命回忆那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看过的书,随后到学校图书馆藏本库,循着记忆找书、翻书,几天下来,毫无所获。拍这张照片时,我刚刚接到撰写《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的任务,第一天到图书馆为该书的撰写地毯式地翻阅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物,记得没翻几本就瞥见了这幅图。动手写《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时,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张图,偏重

的都是与赵南公有关的文字材料。后来,因为我想尽可能地弄清楚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和编辑所,于是重新搜求材料,扩写相关章节,结果发现能找到的图片资料很少,能够与相关文字叙述匹配的图像资料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启用了这张照片。可是等我想要在学校图书馆重新翻找这张照片时,再三搜寻也没能找到。从此,这幅图的出处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三四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寻找,终于找到了这幅图的出处,也找到了与之相关的系列图像;不仅明确了这幅图的来龙去脉,还勾勒出了系列图像修改演变的变化轨迹,亦辨析出了某些以“泰东图书局”为名的图像的真假。

“古人之为学也,必左图而右史。”^②以图证史,^③通过图像触摸,呈现泰东图书局的模样(门市店与编辑所),这无疑最为直观方便。在AI时代,一般人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以及与泰东图书局有关的图像和文字随时重建这个书店的某些历史场景。当下,人工智能生成图像/视频越来越方便,图像资料的真伪鉴别也就越来越重要。一般人没有能力或懒于鉴别这类图像的真伪,因此图像鉴别的重任也就落在了专业研究者们的身上。我在顾寒山的《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里看到一张手绘的泰东图书局图像。如下图所示:



《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手绘泰东图书局图像

这张图虽然很有海派的气势,实际上不过是后人的凭空想象罢了。泰东图书局的大字招

- ① 咸立强:《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② [宋]郑樵:《通志略·图谱略》,第9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③ 参见[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牌很显眼地悬挂在二楼,为了突出这个招牌,绘图削减或弱化了其他店铺的招牌,泰东的位置在图中很是醒目。但是,这张图似乎将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与编辑所合二为一了。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一直位于一楼,其编辑所才在二楼。位于一楼的门市店能不能将招牌挂在二楼?对于泰东图书局来说,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查无实据。首先,泰东图书局编辑所并没有挂这样的招牌;其次,泰东门市店挂了这样的招牌,但是从相关的照片资料推断,招牌不可能挂在二楼那个位置。

顾寒山的《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里的手绘图,看起来与位于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更像(见下图)。1922年8月,郁达夫等人曾在这里召开了《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



一品香旅社图像

顾寒山的《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里的手绘图究竟是不是依据一品香旅社所画,有待商榷,但手绘图绝非泰东图书局门市店应有的模样,这一点毫无疑问。手绘图的可信度显然不能与旧照片相比。若手绘图是当时人所绘,不像的图也还是有其史料价值的;至于《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中的手绘图,绝不能被误作史料使用,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想象泰东门市店的依据。

有一张泰东门市店的照片,店内货物摆放整齐,亮着三盏电灯,人员衣装整洁,似乎是刻意统一着装。泰东图书局并没有给员工置办统一服装的传统,稍显整齐的穿戴,说明这一天很可能是开业之日或有其他重要活动。书局正门面楣上有写着硕大的“泰东图书局”字样的招牌,或许称之为匾更合适。在其右侧稍微靠下

一点的位置,有一个竖立的招牌,上面也是写着“泰东图书局”五个大字。从照片拍摄的角度和比例来看,横牌上的字明显大于竖牌上的字,竖牌悬挂的位置明显低于横牌。以此竖牌推断起来,顾寒山的《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里的手绘图中的竖牌位置显然不对。竖立的招牌底下,有一群伸头探脑的人们,可知此竖牌悬挂的位置比人高。从照片中人们站立的位置和姿势来看,这大概是一张摆拍的照片。当时的照相技术,大概也只能摆拍。我的意思不在于指出照相的技术,而是说明书店似乎未在正常营业,仿佛是在预备开业或搞庆典。由照片中显示的店铺格局等判断,这应该是一间门面,还没有采用玻璃橱窗。我个人倾向于认定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大概是在1916年6月到1919年5月之间。



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照片

沈松泉回忆说:“泰东图书局的发行所设在福州路,离昼锦里(山西路口)不远,双开间门面。店堂后面有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边设一张床铺,靠窗设一张书桌,桌旁一把椅子。赵南公先生平常难得到编辑部去一次,每天下午总坐在这间小屋里会客、谈事情、处理一些问题。”^①沈松泉说的“泰东图书局的发行所”,指的就是泰东图书局在福州路上的门市店。有人称之为发行所,有人称之为门市店,称呼虽然各有不同,其指则一,我统一将其称为门市店。沈松泉回忆中的发行所/门市店,据我推断,应

^① 沈松泉:《泰东图书局·赵南公和创造社——回忆在泰东图书局的几年》,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第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该不是上图所示。上图呈现的门市店,只有一间门面。沈松泉回忆中的“双开间门面”,是泰东图书局1919年迁移大扩充之后才有的。

1919年之前,泰东图书局门市店(即上图所示单开间门面)的门牌号是119号。1914年6月,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经济学要览》(此书为“法政要览丛书”第16编,初版后仅一个月即再版),该书版权页所署发行所地址是“上海四马路一百十九号”。1916年8月20日,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韵琴杂著》,版权页所署总发行所地址是“上海福州路一百十号”。出现地址不同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印刷错误,漏掉了数目字“九”,很可能是门牌号被重新编过,当然也不排除发行所存在搬迁的可能。在这几种可能的情况中,印刷错误的可能性最大。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我认为泰东门市店没有“一百十号”这个门牌号。四马路/福州路119号,位于昼锦里青莲阁茶楼底层,正是在青莲阁楼下。

青莲阁原名“华总会茶楼”,青莲取自李白的号“青莲居士”。许多文化人回忆四马路上的泰东图书局时,大多都以青莲阁为地标。不仅泰东图书局,与泰东相邻的来青阁也是如此。杨寿祺回忆说:“(伯父)独自一人,筹备数月,至1913年2月底亲来上海,当即租定青莲阁楼下东隔壁铺面一间。返苏后将苏店存货合销之书,立即包扎装运至沪,三月初旬正式对外营业。”^①来青阁开业一年后,边上就有了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后来陆续又开办了一些书店。“设在福州路上的书店自河南路转角往西数,有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等。”^②叙述书店,却以青莲阁为地标进行定位,说明这座带有色情意味的茶楼在当时的确相当有名。戴教邦的《新绘旧上海百多图》,其中一幅图的题名便是“青莲阁多野鸡”。在《旧上海》一文中,丰子恺也说四马路就是妓女的世界。郑逸梅1936年在《青莲阁之沿革》一文中写道:“青莲阁为最老之茶肆,距今已历数十年,本世界书局故址,楼下百戏杂陈,如西洋镜小电影打弹子以及角力卫身之器械,无不应有尽有。楼上鬻茶。”^③包树芳描述上海五层茶楼茶馆图画时指出:“从外观图中可以看到,

底层不卖茶,真正喝茶的地方在楼上。”^④上海茶楼底层不卖茶,各种店铺混杂。位于青莲阁底层的泰东图书局,不可能将自己的招牌挂在二楼的位置,那样会妨碍茶楼的生意。上海茶楼之所以被称为茶楼,就在于楼上喝茶视野开阔,别具风味。于此也能见出顾寒山的《民国上海名人故居地图》里的手绘图着实有误。此外从下面这张照片我们也能看出泰东图书局的招牌就是挂在一楼。图中泰东图书局竖立的招牌似乎悬挂的位置较高,其实这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我们仔细看就能发现招牌位于檐下,位置比二楼平台低,只要对比此图右侧底层店铺悬挂的招牌即可明白。



泰东图书局照片

泰东图书局的门牌号在1919年变为124—5号。泰东图书局的广告或版权页一般有四种落款形式:“一百二十四五号”“一百二十四、五号”“一百二十四—五号”“一二五·四号”。1920年10月出版的《泰谷儿小说》版权页用的是“上海四马路中一二五·四号”。版权页上的这些标识表明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从单开间变成了双开间。汪原放叙及亚东图书馆在牯岭路上的房子时说:“牯岭路114号、115号是两个一楼一底,后来116号又把楼面租给了我们,所以是三楼两底了。”^⑤那时候上海的建筑比较

① 杨寿祺:《清末民初苏沪书业之状况》,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第317页。

② 沈松泉:《1925年前的上海文化街》,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第329页。

③ 郑逸梅:《青莲阁之沿革》,《上海报》1936年6月24日。

④ 包树芳:《上海茶馆与都市社会:1843—1949》,第37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

⑤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8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流行的是一楼一底,但泰东图书局的两个门牌号只是楼底的两个门面,没有楼上。

因为我没有找到租界当局有关泰东图书局门市店门牌号码方面的材料,暂时只能以出版物上所留发行所门牌号码为准,如果能找到租界当局门牌设置更换方面的资料,相关讨论无疑就更为切实可靠了。由于租房并无备案制度或有而并不被严格遵守,我们即便找到租界当局的相关资料,大概率也不会找到与泰东门市店搬迁这种小事情相关的资料。从现有资料推测,我认为泰东图书局拥有两开间门面的具体时间,应该不晚于1919年6月,判断的依据主要是泰东图书局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

1919年8月31日,《申报》第14版刊登了《“学生救国全史”预约通告》。全文如下:“学生界不可不看!教育界不可不看!工商界不可不看!欲知近来中国大事者不可不看!欲知此次学潮真相者不可不看!《学生救国运动》全本。良心主张,并无丝毫权利思想存杂其中。是以各界迫于义愤,酿成罢市罢工风潮,实为我国近来第一件惊天动地之事。不可无信实之。更昭示来兹。市上虽有数种出版物,因急于付梓,非偏拘一隅,即草率成篇,凡身历其境者莫不引为恨事。有鉴于此,特请潘公展先生尽三阅月之苦心编辑各方面之报告,抽暇编辑《学生救国全史》一部,业已告竣。先生为上海学生联合会评议员,且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月刊》总编辑,所见所闻自较局外人尤为亲切。幸得诸同志之赞助,积书盈尺,择要纪载,集成此不可多得之完璧。是书之价值,不问可知。至体例之精严,材料之丰富,搜罗之完备,当为有目所共赏,无烦赘述。此外如商界工界之种种问题,凡学生救国运动有关系者,无不旁征博引,互相参证,且于当时出力人员公具姓名,不忍湮没,一一备录,更觉耐人寻味。书都二十余万言,共分十章,每章数节,每节数篇,从头至尾井然有序。洋洋洒洒汇成巨著,洵救国声中之第一大纪事书也。倘蒙爱国诸君人手一编,作为过去之历史观可,作为现在之喝棒观亦可,作为将来之殷鉴观亦无不可。书用美国纸精印,洋装一厚册,每部定价大洋一元六角,现已付印,预约特价八角。准定阳历九月底出书,决不逾期。”广告落款:“印行者

富文书局,预约总经售处(上海四马路中)泰东图书局启。”详细抄录这则广告,一是这则广告显示了参与五四运动的赵南公与学生救国联合会有了关系,二是泰东图书局在这一天的《申报》上只在此则广告中出现。那么这则广告究竟是富文书局刊登的,还是泰东图书局刊登的,有待详考。因“启”字落在泰东图书局后面,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广告的刊登者就是泰东图书局。我仔细查阅了1919年的《申报》,这则广告之前,《申报》上与泰东图书局有关的广告,要么不署具体地址,要么只写“四马路”或“上海四马路中”;在这一则广告之后出现的便是“泰东图书局迁移大扩充纪念特价”广告。综观这一时期泰东图书局在《申报》上刊载的各类广告,大致可以确定其搬迁新店且正式开始营业的时间应该是1919年9月。

1919年9月3日、6日、7日、14日、16日、18日、23日、25日,《申报》第15版连续刊登了“泰东图书局迁移大扩充纪念特价”广告。广告篇幅较大,版面醒目,费用应该不菲。按常理推断,我认为1919年9月初应该就是泰东图书局搬迁后开门营业的时间。9月3日、6日、7日的广告完全一致,都在广告开篇宣示了搬迁后的具体地址;自9月14日起,广告更换了开篇一段文字,删掉了搬迁后的具体地址信息。其中,9月6日的广告如下:



《申报》1919年9月6日

“泰东图书局迁移大扩充纪念特价”广告

广告开篇简单介绍了书局迁移事宜以及新的地址:“本局出版各种名家著述,久蒙海内外所称许,曷胜欣幸。前因旧屋翻造,迁至四马路一百二十四、五号,照常交易。本拟举行扩充纪念,当时迫于爱国热潮激成罢市,嗣后又淫雨连绵,迄不果行。今幸金风乍转,灯火可亲,特将本版书籍一律减价并附赠品。”从这段广告文字可知,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搬迁,似乎是在上海罢市之前,即1919年6月初就搬迁完毕,只是

因为罢市等缘故,扩充纪念一直拖延至9月份才举行。

从119号搬迁到124号,不过相隔五个号码,这个挪动距离尚不至于让老顾客找不到门市店的新位置,赵南公为此特意连续在《申报》刊载广告,主要目的当然是营销。以新门店的开张为由进行营销,这是现代商业惯用的手段。这次搬迁后,门市店的店面扩大了。我认为正是在这次搬迁后,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从一个门面变成了两个门面,具体的表现便是门牌号码占了两个。

“泰东图书局迁移大扩充纪念特价”广告透露出来的搬迁信息,在某些泰东版图书的版权页中也能找到相关的佐证。《青岛潮》第一集于1919年8月10日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版权页上标注的总发行所泰东图书局的具体地址是“上海四马路一二四、五号”。该书共分为十五章,书前《凡例》声称:“本书专纪此次抗争青岛之始末。由第一册,以至四五六册不等。不同坊间仅一册而已。不能观其究竟者比也。”^①这本书于1919年7月5日编成,仅用一个月便出版发行,“因从速付印,草草编成,非有严整之组织”^②,不免有讹误粗疏。《青岛潮》版权页上标注的出版时间及发行所地址告诉我们,泰东图书局租定新门市店拥有两个门牌号的时间,远比1919年9月要早,迁移的时间很可能是1919年6月,甚或是1919年5月;但是不可能早于5月,因为5月1日、3日、7日、9日的《申报》第4张第14版(或15版),都用四号宋体字刊登了一行广告:“迁移在即,各货堆积,特设廉价,欲购从速。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谨启。”迁移之前,泰东图书局可能已经租好了地方,但是我认为还是以迁移时间作为真正拥有两个门面的门市店的时间比较好。从迁移到正式开门营业,这之间似乎也还有一个时间段。我认为泰东图书局原定的开门营业时间应该是5月中下旬,否则不会在5月上旬那么密集地刊登迁移广告;而就在泰东图书局准备新门市店开门营业的时候,上海迎来了6月3日的罢市,这应该直接影响到了泰东新门市店的迁移与营业问题,是以直到1919年9月《申报》上才又重新出现迁移纪念廉价的广告。

1919年9月15日,泰东图书局发行了姚鑫振编译的《战后太平洋问题》,这本书的版权

页上标注的是:中华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第壹版印刷,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八日第壹版发行。发行者:上海泰东图书局;印刷者: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上海中华书局;总发行所: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该书并没有标注泰东图书局新门市店的门牌号码。1919年10月2日、3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连续刊登了这本书的预约广告,“姚伯麟先生著及译述,孙中山先生序及题签。全书二十四万言,定价一元六角,预约大洋八角”,最后用大号黑体加粗字体印“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发行”,也没有门牌号。值得注意的是,版权页上标注了9月15日出版,10月2日的广告上还在宣传预约,很可能该书没有在版权页标注的日期真正出版。

泰东图书局1919年的出版物不多,我努力查找各出版物的版权信息,希冀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可惜没有。我以为《青岛潮》版权页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此时泰东图书局应是已经租定了新的门市店,只是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或者已经正常营业却没有举办过什么仪式。但是,图书广告中的话就真实可靠吗?书籍版权页上的时间就一定确切无疑吗?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虚假的广告,版权页与实际出版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将泰东门市店的搬迁时间视为1919年6月至8月之间,不妨将1919年9月视为赵南公正式启动其重建理想的新泰东的时间。

尽管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物版权页有时用四马路一百二十四、五号,有时只用四马路一百二十四号,但是从《申报》刊登的“泰东图书局迁移大扩充纪念特价”广告来看,泰东在搬迁后便是两个门面。从一个门面变成了两个门面,所以赵南公说是“迁移大扩充”,一个“大”字,尽显其得意之情。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双开间门面究竟有多大?这在时人眼里可能觉得世人皆知,毋须多说。作为后人的我们却只能通过各种信息进行揣测。沈松泉“十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个说法就很具体,让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房间的大小。他将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视为小

① 龚振黄:《青岛潮·凡例》,上海:泰东图书局,1919。

② 龚振黄:《青岛潮》,第3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19。

房间,底子里也透着一股阔气。当然,所谓小也可能只是表示比较,与双开间的门面相比就显得小。沈松泉既然称十六平方米的房间是小房间,那么双开间的店堂至少比两个小房间加起来还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才比较合理。推算起来,泰东图书局在福州路上的门市店面积至少也要有四十平方米。

“迁移大扩充”之“大”,我们还应该从理想追求的角度予以理解。“迁移大扩充”的根本原因就是赵南公受时代风潮感召,想要在新文化运动中有所作为,准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重建与大迁移的关联,除了门面变大之外,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泰东图书局挪出了青莲阁的范围。温梓川在《新书业与作家》一文中说,泰东图书局“在上海四马路最著名的野鸡湊集的青莲阁茶楼隔壁”^①。言“隔壁”而不说是楼下,证明温梓川看到的是泰东图书局门市店已经搬迁后的门面了。村松梢风在《魔都》中写道:“青莲阁沿街有几十间门面宽,总共是两层楼的建筑,楼下分割成了好几家普通的店铺。”^②此时来到上海的村松梢风,看到的泰东图书局就已经不在青莲阁楼下了。

当初,泰东图书局和青莲阁同处一栋楼。青莲阁在楼上,泰东图书局在楼下,前者代表的是肉欲,后者代表的是精神。在魔都上海,一条聚集了罪恶与堕落的马路上,绽放出艳丽的现代文明之花。换一个角度看,娼妓遍地的四马路本身就是自由欲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20世纪的现代思想相反相成。高长虹谈到上海的特色时说:“肉。这是不必逛游艺场或夜半十二点钟行过青莲阁才可以看见的。”^③“肉”即肉欲,与青莲阁相关,指的就是娼妓业。陈无我说:“清光绪间,四马路一带,书馆林立,然座场宽敞,歌妓最多者,推天乐窝为第一。”^④这里所说的“书馆”,指的是书寓,即高级妓院。上海的文化街与妓女似乎总是相伴而生。后来北四川路成了现代作家和书店的聚集区,妓女们也随风而至。高长虹在文章中说:“前几日,有一种报纸上又说北四川路是神秘的街,因为北四川路的淫业发达有凌驾四马路的势头。”^⑤灵魂与肉欲相邻,与郁达夫小说创作经常表现的“灵与肉的冲突”很契合。汪孟邹回忆自身的出版经历时说:“我们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是由于个性使

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我与同业群益主人陈子佩、子寿昆仲,泰东主人赵南公,太平洋主人张秉文诸老友时常要闲谈,都说:‘我们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⑥出版图书还是开妓院,将二者并列作为选择项,不仅是为了形成有力对比,也是当时上海的书店与妓院毗邻而居的实在言语中的自然反映。

张爱玲谈《海上花》时说,传统社会里的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该不是偶然的巧合”^⑦。追求恋爱自由的新文艺与妓院毗邻而生,借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想来也“该不是偶然的巧合”。晚清小说喜欢写妓院里的爱情故事,这也是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娼妓毕竟与新思想不能兼容。赵南公和王无为等发起废娼运动,并非只是为了博人眼球。作为新书业的先锋,赵南公的思想在同时代出版人中显得相当进步。泰东门市店搬迁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与青莲阁有关。迁移之后,泰东门市店离青莲阁茶楼稍微远了一点。这次“迁移”与废娼运动及重建理想的新泰东等联系起来,无疑就是一个象征,或者说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新文艺出版正是通过灵与肉的分离逐渐确立了自身的位置。

① [马来西亚]温梓川著,钦鸿编:《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第3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日]村松梢风:《魔都》,徐静波译,第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③ 高长虹:《每日评论·上海的特色:经济与肉》,《长虹周刊》1928年第8期。

④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53页,上海:大东书局,1928。

⑤ 高长虹:《每日评论·神秘的街》,《长虹周刊》1928年第6期。

⑥ 汪孟邹:《我与新书业——答萧聪先生》,《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

⑦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联合报·副刊》(台北)1983年10月1日。

在我看来,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迁移大扩充”本身就是中国书店现代化想象的产物。中国传统生意人秉持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中国书店开始重视选址和门面等事项。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搬出弄堂,迁至棋盘街临街的位置,这是受到了陈独秀的提点。亚东图书馆的事业就像汪孟邹说的那样,“‘五四’前后,出版才上了路”^①。泰东图书局本就临街,为何还要搬迁大扩充?赵南公是否从汪孟邹那里得到了什么消息?或者说陈独秀对汪孟邹的指点也让赵南公受益甚多?亦或者赵南公完全凭借个人的感觉洞察了时代的先机?考虑到1919年的新书业发展并不是很理想,搬迁大扩充之举对于一个小书局来说着实属于超前行为。其中的缘故,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就是一个谜题。无论如何,“五四”风潮激荡,泰东图书局和亚东图书馆这两个最先改换出版风气的小书局,不约而同地改换了门面。它们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成了新文化出版的先导。

沈俊盛等在1981年绘制了《解放前福州路(文化街)一览》,图中详细展示了“1948年至1949年初上海福州路一带书店分布状况”^②。那时候泰东图书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张一览图用“图注”的方式标注了泰东图书局曾经的位置,即山西南路与福州路交叉口。这张图中标识的所谓泰东图书局旧址指的就是其在福州路上开设的门市店。这个旧址指的应该是搬迁后的地址。

泰东图书局在1919年搬离了青莲阁的楼底,青莲阁在1931年也搬迁了。因此,只能说1919年前的泰东图书局位于青莲阁楼下,这个青莲阁自然指的是搬迁之前的青莲阁。1932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③这里提到的青莲阁,就是搬迁后的青莲阁。“1931年,青莲阁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于是茶楼主人另觅新址重建,从福州路山西路西迁至福州路湖北路口。”^④1932年,世界书局发行所迁到福州路390号建的四层七开间楼房,此处即青莲阁茶楼旧址。青莲阁茶楼这所地标性建筑消失了。代表精神文明的书店取代了妓女聚集的场所,这也可以看成是大上海完成自身蜕变,逐渐树立其文化中心(自然也是中

国现代文学中心^⑤)地位的一个象征。

危楼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泰东图书局。泰东门市店自从1919年9月搬迁后,直到最后关门,也没有再行迁移。当然,这中间泰东并非没有遭遇搬迁的危机。1921年11月22日,赵南公在日记中记载了他联合四马路其他商家反抗房东收房的斗争:“公廨今日已有示谕,房子事不必再要求房东赔偿搬迁之损失,应根据公堂示谕要求不搬。”^⑥从日记可知,泰东图书局和其他商家都被房东要求退房,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房租上涨,房东想要谋取更多的租金。开始时赵南公等人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后来则变成了要求不搬。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赵南公带领众商家维护自身权益,议事地点多在泰东图书局门市店。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利于泰东图书局自身的发展,也为赵南公赢得了周围商民的拥护。

至于搬迁后的青莲阁,《民国里的上海:上海地方生活素描》^⑦中有一张照片,我认为其来源当是《良友》(1935年12月第112期)。《良友》上刊登的照片如下:



青莲阁照片

-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 ② 俞子林:《上海福州路文化街概述》,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第343页。
-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④ 包树芳:《上海茶馆与都市社会:1843—1949》,第95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
- ⑤ 参见朱寿桐:《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 ⑥ 赵南公:《赵南公日记》(影印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⑦ 本书编写组编:《民国里的上海: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1931年搬迁后的青莲阁,也是鲁迅到过的地方。这里的青莲阁楼下没有泰东图书局。我们若是据此照片想象泰东图书局,自然大错特错。在这张照片中,硕大的“青莲阁商场”五个字占据了大概两个门面的宽度。字太大,每个字都是单独镶嵌的,不在一块牌匾上。楼下店铺用牌匾的,都不超过一个门面的宽度。对照起来,我认为前文所述泰东图书局的牌匾,大概与这张照片中的“群芳会唱”相似:上面是店名,下面是经营品类,宽度就是一个门面。

从1919年9月起,泰东图书局在福州路上的门市店就有了两间门面,这两间门面一直维持到1930年代。泰东图书局在1930年代营业不善,“虽不是日蹙千里,终于由两间门面缩成一间门面,终于关了门”^①。究竟是哪一年泰东门市店的门面缩减至一间门面?据我推断,大概是1934年。原因主要是1934年之前泰东图书局出租纸型给其他书局者很少,1933年既有“复兴”之举,又让钱杏邨等左翼文人举家在泰东借住,说明泰东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了1934年,左翼文人去泰东借住这类的史料就没有了,而泰东出租纸型的行为却骤然增多。综合起来判断,1934年泰东缩减门面节约开支的可能性最大。有些泰东图书局出版物版权页只标注福州路“一二四号”,即单号,而不是惯用的“一二四一五”双号,其中反映的可能就是门市店门面的缩减。

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乘船到上海,去的是“迁移大扩充”之后有两间门面的泰东门市店。毛泽东在1921年8月造访泰东图书局,到的也是这里。遗憾的是,除了沈松泉,很少有人具体回忆这个有着两间门面的门市店。我在《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中一定要用那张手绘图,原因就在于此。那张标注了“泰东图书局”的手绘图,我以为多少能对想象这个门市店提供一些帮助。然而,当我重新找到这张图的出处,追索这张图的来龙去脉,却发现剔除了背景的图绝不能作为历史想象的依据。这张图出自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臄盒客座谈话》(精装一册、平装二册)一书。下图就是 I 再次找到后重新拍摄的。这幅插图的牌匾上有硕大的“泰东图书局”五个字,与前文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照片中

牌匾上的字体很相似。我们若是不了解这张图的来龙去脉,很容易认为这张图就是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素描。



《臄盒客座谈话》中泰东图书局图像

泰东版《臄盒客座谈话》一书所收的这张插图,作者吴稚晖,画的其实是伦敦的书店,而非泰东图书局。《臄盒客座谈话》中,客问:“所谓报帖之牌,满于卖报店之门前者,为状不知若何?若如上海烟纸店之模样,牌将置于何处?请言其详。”吴稚晖先是叙述了西洋书店的样子,然后叙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店铺样式,而后又说,“西洋卖报店,十八九皆兼售文具,故吾适才想及琉璃厂之南纸店,略似其文具店,即文具店与卖报店,两相映带于吾之脑中。而文具卖报店之大者,间亦代售书籍。上海朋友若欲留一形貌相似之意形。则四马路就华式房屋,改良而装门窗之书店近之矣。亦文具书籍,陈列满窗,仅少窗脚下之报帖牌,玻璃门前之悬报架,里面柜台边之报摊报台耳。然此种书报文具店,亦不过局面甚大之街市方有之,本栏草绘一图,乃伦敦文具卖报店之普通式状。”^②笔者所见《臄盒客座谈话》为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此书在1919年3月1日初版发行,通俗教育研究会于该书初版当月就向教育部提交了将《臄盒客座谈话》作为讲演参考用书的呈请,并于当

① 曹聚仁:《泰东图书局》,《书林三话》,第1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② 吴稚晖:《臄盒客座谈话》,第4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

年8月6日得到教育部核准同意的批示(《政府公报》1919年第1264期)。书中文字明确指出,上图“乃伦敦文具卖报店之普通式状”,并非1919年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素描!然而,吴稚晖在谈话中说,“四马路就华式房屋,改良而装门窗之书店近之矣”,既然“近之”,那么将四马路上开新书业之先声的泰东图书局视为如此模样,似乎也并无不妥。翻查最初刊发《舐盒客座谈话》的《中华新报》,我在1917年2月2日《中华新报》第三张上找到了吴稚晖的手绘图,全图如下:



《中华新报》吴稚晖手绘图

《中华新报》上这幅图中写的是“A SMITH & CO”,并无“泰东图书局”几个字。由此可知,泰东图书局编辑(我认为就是赵南公自己)在出版时,改动了原图,加上了自己书店的招牌。不尊重原作,随意改动原图,也不管图文是否匹配的问题,这样的编辑出版行为很让人讨厌。暗自嵌套店名进行广告宣传,显示了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生意”经,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书店发展的愿景,即期待泰东图书局也能像伦敦的书店门面那样具有现代气息。泰东图书局的做法,后来也被续出《舐盒客座谈话》的其他书店采用。



群众图书公司图像

上图见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年版《吴

稚晖先生全集》所收之《舐盒客座谈话》,只是图中文字被替换成了“群众图书公司”。群众图书公司的创办者方东亮,曾在泰东图书局任职。《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收入的《舐盒客座谈话》,排版形式等皆与泰东版相同。群众图书版在绘图上添加文字插播广告,一如泰东图书局所为,可谓撬老东家的墙脚不遗余力。上海全民书局1928年出版了陶乐勤编订的《吴稚晖先生文粹》,卷三收入《舐盒客座谈话》,其中并无上述插图。1925年6月,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了周云青编纂的《吴稚晖先生文存》(上、下册),1926年1月便出至三版,可见吴稚晖著作很受读者青睐。《吴稚晖先生文存》下册收录了《舐盒客座谈话》,文本用的应该是泰东版,但是未收插图。

泰东版《舐盒客座谈话》风行一时,群众图书版《吴稚晖先生全集》也颇有影响,笔者未见有人对泰东、群众擅自添加、删改图中文字提出异议。吴稚晖谈到《舐盒客座谈话》时说:“在《中华新报》充当编辑时,到了夜深,那位做报屁股的陈白虚先生,要我凑点材料,我就立一个名目,叫做《舐盒客座谈话》,每日乱写一段,于是过了半年,泰东图书局就把他剪下来,算做一本书。”^①吴稚晖所说的“过了半年”,大概指的是1917年上半年,即客座谈话在报纸上断断续续连载了半年,然后被泰东图书局剪下来做成了一本书。剪辑《中华新报》上的连载文字编成一本书,似乎是当时的惯用手法,也说明了《中华新报》和泰东两家关系紧密,合作无间。吴稚晖没有谈及泰东图书局是否删改文字等问题。笔者推测吴稚晖应绘制过草图,泰东版《舐盒客座谈话》中的插图经过编辑的修改,吴稚晖很可能知晓此事而不以为意。

泰东图书局门市店有没有搞过玻璃橱窗?笔者没有见到确凿的史料,但是在章克标的小说《银蛇》中看到了对泰东图书局玻璃橱窗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张岂杰晚上从四马路群集的歌女娼妓中穿过,急走几步进了一家书店,“恰好这中国书店是和作新社生过关系的。作新

① 秦同培编:《吴稚晖言论集》下册,第24页,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

社大部分的书都从这地方出卖,他看见轰动了一时的他们的作品。葛摩石的雌鬼,张子平的冰河里的残骨,邵逸人的毁灭等等,都是一时青年崇拜的标的。还有停刊了的杂志之类,却合订了又出卖,在书柜上堆得高高地睥睨着一切。他隔了书橱的玻璃窗,望了许多新旧书的著者,那许多新成名老成名的作家的名字,横横直直都挺尸在书面上,出了一回神”^①。小说中提到的四马路上“这中国书店”,就是泰东图书局。小说中的“作新社”指的就是创造社,“葛摩石的雌鬼”应该理解为“郭沫若的《女神》”,“张子平的冰河里的残骨”当是指“张资平的《冰河时代》”,“邵逸人的毁灭”即“郁达夫的《沉沦》”。章克标的这本小说落款日期是1928年8月。小说中,邵逸人对张岂杰说:“作新,我不过做过几篇文章,没有多大关系,而且现在是完全无关了。”^②“作新”即创造,这句话是在叙述自己和创造社之间的关系。郁达夫发表脱离创造社的声明是在1927年8月,也就是说,张岂杰到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时间就是在1927年8月到1928年8月之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章克标小说里的描述知道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已经有了玻璃橱窗。

泰东图书局的玻璃橱窗究竟是什么模样?因为图像/照片资料缺乏,暂时难以确考。我们从赵南公心仪吴稚晖的手绘图纸来看,很可能就是那种模样,通过吴稚晖的手绘图想象泰东图书局的玻璃橱窗,按图索骥,庶几近之。吴稚晖绘制的插图虽不是泰东门市店的素描,但其装修风格很可能受到了这幅插图的影响,甚或

就是照着这幅图装修的。标注了“泰东图书局”字样的吴稚晖的手绘图虽然不“真”,但作为史料依然有其价值,即这幅图充分显示了那一时代书店经营者所希冀的装帧模样。尼采谈到过“像如何成为是”^③的问题,就吴稚晖手绘图的演变轨迹而言,其无疑构成了对“像如何成为是”的现代想象的一个注解。就此而言,以泰东图书局为代表的中国书店装帧的现代化,颇有些按图索骥的意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泰东图书局史论”(25FZWA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代表作有《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中国出版家 赵南公》《立意为宗与现实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与文学理想》《从剧本到舞台:曹禺〈雷雨〉戏剧艺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十讲》等。

①② 章克标:《银蛇》,第73、42页,上海:金屋书店,1929。

③ [德]尼采:《论道德感的历史》,孙周兴主编:《尼采卷》,第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